

乡村振兴理念下的三亚市博后村发展规划研究

文 / 施家鑫 海南中元市政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摘要：本研究以“内生动力激活-空间形态重构-治理机制创新”为逻辑主线，系统探讨博后村在产业升级、文化传承、生态保护等维度的转型路径。通过田野调查与规划分析，提出以黎族文化价值转化为核心的产业生态圈构建策略，建立“山-海-田-村”复合空间的多维重构方法，创新“多元共治-数字赋能-文化反哺”协同治理模式。
关键词：乡村振兴；三亚；博后村；发展规划

【DOI】10.12254/j.issn.2096-6539.2025.16.113

引言

全球化与城市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乡村发展面临“传统消解”与“现代性植入”的双重挑战^[1]。三亚市博后村作为黎族文化保存较完整的滨海村落，既是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的前沿阵地，也是热带地区乡村振兴实践的重要样本。其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与快速成长的民宿产业集群，构成了多重发展命题交织的复杂场域。

一、乡村振兴与乡村发展规划的关系

表1 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内涵

主题	核心内容要点
战略背景与核心目标	乡村振兴战略的多维内涵及其对发展规划的指导作用
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	战略定位与实施路径的辩证关系在规划中的具体体现
空间治理的方法论革新	多维空间重构对传统规划思维的突破与创新
文化生态复合系统的整合	地域特色要素在规划中的系统整合与价值转化

在三亚市博后村的特定语境下，发展规划的制定需既要遵循乡村振兴战略的普遍规律，又兼顾热带滨海地区乡村发展的特殊性，这种双重属性决定了规划实践的创新空间与挑战边界。

从学理层面审视，乡村振兴与乡村发展规划构成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价值导向与目标指引，后者则为前者构建实施路径与方法支撑。这种关系在具体实践中体现为战略定位与项目落地的有机衔接、政策体系与空间布局的协同匹配^[2]。博后村作为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典型村落，其发展规划既要回应国家乡村振兴的共性要求，更要解决滨海旅游型村庄在生态保护、产业升级、文化传承等方面面临的特殊命题，这种双重任务决定了规划体系必须兼具战略高度与实践深度。

在空间治理维度，乡村振兴理念赋予乡村发展规划新的方法论内涵。传统规划偏重于物质空间形态的塑造，而新时代的规划实践则强调社会空间、文化空间、生态空间的多维重构。对于博后村这类具有黎族文化特色的滨海村落而言，规划需要建立文化基因与空间形态的对话机制，在民宿集群布局、公共空间营造、生态廊道建设中植入文化记忆与地域特征。这种空间生产方式的转变，本质上是对乡村振兴“塑形”与“铸魂”要求的双重回应。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顶层设计，其核心在于通过系统性重构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一战略突破了传统乡村建设的单一维度，将产业升级、生态保护、文化传承、治理创新和民生改善纳入整体性框架，形成多维联动的乡村发展新模式。作为国家战略的实践载体，乡村发展规划既是乡村振兴理念的具体化工具，也是协调多元主体利益、统筹各类资源要素的操作指南。本章核心内涵可概括为下表内容：

文化与生态要素的整合构成了乡村振兴理念下规划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在博后村的特定语境中，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与黎族传统文化构成双重基底，这要求发展规划必须超越简单的功能分区思维，建立生态-文化复合系统保护机制。通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嵌入空间规划，将生态敏感区保护要求转化为建设管控指标，实现自然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协同增值^[3]。这种整合性规划思维，既是对传统规划工具理性局限的突破，也是乡村振兴人文关怀与生态价值的具体彰显。

二、三亚市博后村发展现状分析

（一）博后村概况

博后村位于三亚市吉阳区东北部，毗邻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地理坐标介于北纬18°14'至18°18'之间，属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村庄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户籍人口约1500人，黎族占总人口的95%以上，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村落。村庄依山傍海，拥有独特的自然景观资源，村域内分布着热带果园和黎族聚落，形成“山-海-田-村”有机融合的空间格局。近年来，随着三亚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的推进，博后村被纳入亚龙湾旅游经济圈辐射范围，交通条件显著改善，村内主干道与环岛高速实现无缝衔接，基础设施覆盖率达92%。

(二) 博后村产业发展现状

以旅游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构成博后村经济发展的核心特征。依托亚龙湾高端酒店群的溢出效应，村庄自2017年起转型发展特色民宿产业，目前全村已建成56家主题民宿，客房总量超过800间，形成“宿集经济”的规模化效应。2023年统计数据显示，民宿产业吸纳本村劳动力就业占比达65%，年接待游客量突破45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占村集体经济总收入的80%以上。农业作为传统产业仍保持基础性地位，芒果、莲雾等热带水果种植面积约800亩，但受土地资源限制和旅游用地竞争影响，农业生产逐渐向观光体验方向转型，形成“民宿+果园”的农旅融合模式。值得注意的是，产业链条延伸不足、同质化竞争加剧等问题逐渐显现，亟待通过品牌化运营和业态创新实现突破。

(三) 博后村生态旅游环境现状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博后村考察时曾留下“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的殷殷嘱托，博后村充分利用亚龙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区位优势，旨在将博后村打造为以民宿集群、玫瑰特色花卉产业和旅游服务业为主的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农文旅深度融合的特色旅游小康村和国家级乡村振兴样板示范村。作为三亚生态保育体系的重要节点，博后村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本底。村庄绿化覆盖率保持在65%以上，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达98%，固体废弃物分类收集体系基本建成。同时，旅游开发的生态压力不容忽视：民宿建设导致局部地块硬化率上升，夜间光污染对周边生物节律产生影响，部分滨海区域存在游客活动干扰潮间带生态等问题，生态保护与经济平衡仍需加强。

(四) 博后村文化建设现状

黎族文化是博后村最具辨识度的精神标识。博后村通过空间优化，保障公服用地需求，建成了文博馆、党群服务中心和小康广场等综合文化服务设施，提高了村庄旅游文化接待和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利用党群服务中心成立现场教学点，截至2023年底，已接待各类培训200余次。但文化传承面临代际断层风险，青年群体对传统文化的掌握度及兴趣不足，商业化开发中文化内涵的浅表化利用现象较为突出，亟需建立文化保护与创新发展的长效机制。相关内容总结见下表2：

表2 三亚市博后村概况总结

分析维度	核心内容
地理区位	三亚吉阳区，亚龙湾旅游圈辐射范围，热带海洋性气候，山—海—田—村复合空间格局
人口与经济	户籍人口1500人（95%黎族），民宿56家，旅游收入占比80%，农业向观光体验转型
文化特征	建成了文博馆、党群服务中心和小康广场等综合文化服务设施，提高了村庄旅游文化接待和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三、乡村振兴理念下三亚市博后村发展规划策略

(一) 内生动力培育与产业生态圈构建

乡村振兴的本质在于激活乡村自身的造血功能。博后村的产业升级需突破传统旅游经济的路径依赖，构建以文化价值为核心、多元业态协同共生的产业生态圈^[4]。通过挖掘黎族文化基因与热带滨海资源的耦合价值，推动民宿产业从规模扩张转向品质提升，重点培育具有文化辨识度的主题民宿集群。在空间布局上，以现有民宿集聚区为基础，通过功能分区引导形成“核心体验区—文化衍生带—生态缓冲区”的圈层结构，核心区聚焦深度文化体验，衍生带延伸手工艺工坊、非遗研学等业态，缓冲区则通过生态农业与低强度活动维持环境承载力。

产业生态圈的构建需强化要素整合能力。将热带农业从单一的观光采摘向创意农业转型，开发农业景观艺术化、农产品文化IP化的新型模式。例如，将黎族图腾符号融入果园景观设计，将传统农耕器具转化为旅游体验装置，实现农业生产空间向文化消费空间的转化。同时，打通产业链上下游环节，引导村民从服务提供者转变为文化传播者、创意生产者，培育本土化的文旅运营团队。通过建立民宿联盟、农产品共营平台等协作机制，形成

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产业共同体，增强抵御市场波动的韧性^[5]。

在业态创新层面，需把握“旅居融合”发展趋势，突破传统“住—游”分离的旅游模式。利用博后村毗邻亚龙湾的区位优势，构建“滨海度假—乡村旅居”的双向引流体系，设计跨场景的消费动线。例如将高端酒店的水上运动项目与村落的黎族渔猎文化体验串联，形成差异互补的产品组合。夜间经济作为重要增量空间，可通过沉浸式黎族文化展演、星空主题休闲等项目的开发，延长游客驻留时间。值得注意的是，产业升级需建立文化保护与商业开发的动态平衡机制，通过设立文化资源开发阈值、制定传统技艺传习标准等手段，确保文化内核不被消费主义解构。

(二) 多维空间重构与地域特色传承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空间规划需超越物质形态更新，转向社会关系、文化记忆与生态价值的系统性重构。针对博后村“山—海—田—村”的空间基底，规划应以生态敏感性评价为基础，划定三级开发管控分区：针对博后村已有的自然生态资源，应做好保护工作，牢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限制建设黎族传统聚落所在的文化保留区，适度开发民宿集聚区与农业体验区组

成的弹性发展区。通过构建生态廊道串联分散的自然与文化节点,形成“绿脉贯通、组团生长”的空间格局,既保障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又强化地域文化景观的连续性^[6]。

在建成环境营造中,需建立传统营建智慧的现代转译机制。针对富有民族特色的建筑,其构造形式、村落肌理的组织逻辑,可通过当代建筑语言重新诠释,特色的民族元素应尽量保留,抽象为民宿建筑的立面符号,将村落“背山面水”的选址智慧转化为当代景观设计原则。公共空间的更新应注重文化记忆的存续,利用废弃宅基地改造为非遗展示馆,将古树、古井等历史印记转化为社区文化地标。通过“微更新”手段对村巷界面进行渐进式改造,在保留原有空间尺度的基础上植入休憩设施与艺术装置,实现传统空间肌理的活化利用。

生态空间的价值转化需要创新保护利用模式。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不应局限于隔离式管控,而应通过栈道系统、观鸟平台等低干预设施的植入,构建人与自然对话的界面。将生态修复工程转化为科普教育载体,设计湿地生态研学路线,使环境保护行动本身成为旅游吸引物^[7]。农业生产空间的优化需打破单一功能定式,通过轮作景观化、田埂艺术化等手法,将农田转化为兼具生产性与观赏性的复合空间。在文化空间再生产过程中,需建立“物质载体-非物质文化-当代生活”的联动机制,例如围绕农田、果园、花海、黎族文化打造公共艺术创作主题,赓续农耕文明,同时使黎族文化传承和艺术活动融入日常空间体验。

(三) 协同治理机制与社会价值共创

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性取决于治理体系的创新重构。博后村需突破传统“政府主导-村民参与”的二元治理框架,构建政府引导、村民自治、市场驱动、社会协同的多元共治格局。通过建立“村集体+专业机构+村民代表”的联合决策平台,将规划编制、项目审批、收益分配等核心环节纳入公开协商程序,确保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得到制度化表达。例如,针对民宿扩建引发的土地权属争议,可设立由法律顾问、乡贤代表、行业专家组成的调解委员会,在尊重村规民约的基础上引入现代法治规则,形成兼具包容性与规范性的矛盾调处机制^[8]。

治理效能的提升则需要激活社会资本的内生动力。通过重构村民与村庄的情感联结,培育“新乡民”群体参与社区治理。具体而言,可建立民宿经营者与本地村民的技能共享机制,将外来投资者的市场经验转化为村民能力建设的资源;同时,引导返乡青年成立文化创客联盟,通过短视频创作、文化IP孵化等途径,构建“传

播即治理”的新型参与模式。在公共事务决策中,尝试采用参与式预算、社区议事厅等工具,将道路修缮、景观改造等小微项目交由村民自主提案与实施,逐步形成“需求自下而上、资源横向整合”的治理路径。

此外,可依托“数字孪生”技术构建村庄三维管控模型,集成生态监测、游客流量、基础设施运行等实时数据,实现规划实施的可视化监管与预警。在文化治理领域,可通过区块链技术对黎族非遗技艺进行数字确权,建立文化传承人数据库与数字博物馆,确保传统知识在传播中的原真性^[9]。此外,搭建线上村民议事平台,利用大数据分析识别公共服务的短板,例如通过游客评价数据优化垃圾清运路线,借助社交媒体舆情调整文化活动策划方向,使治理决策更具科学性与响应性。

结语

博后村的规划研究表明,乡村振兴并非简单的物质空间改造或经济指标提升,而是涵盖文化价值重估、社会关系重构与治理范式创新的系统性工程。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关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对乡村要素流动的影响,探索跨境旅游、数字贸易等新业态与传统乡村社会的融合路径,推动乡村振兴从“政策驱动”向“内生发展”的范式跃迁。

参考文献

- [1] 朱晓彤. 乡村振兴背景下三亚市乡村美食旅游开发实践与研究[J]. 中国食品工业, 2024(7): 56-58.
- [2] 唐盛仙, 孙行. 高质量发展视阈下职业教育赋能三亚市乡村人才振兴的实践路径探索[J]. 农业工程技术, 2024, 44(14): 117-120.
- [3] 侯雪. 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三亚市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J].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 2024(7): 152-154.
- [4] 刘运良.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促进三亚市乡村振兴的路径探析[J]. 南方农业, 2023, 17(24): 141-143.
- [5] 杨东伟, 李丽, 陈振, 陈方园, 乔笑笑, 刘宏兵. 三亚市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及实现路径[J]. 黑龙江农业科学, 2023(1): 108-111.
- [6] 陈明媚, 张洁, 田小彪. 乡村振兴背景下三亚市大社区治理模式研究——以三亚市S大社区为例[J]. 新丝路, 2022(1): 72-73.
- [7] 索思彤.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实践与启示——以海南省三亚市博后村为例[J]. 当代县域经济, 2023(11): 66-68.
- [8] 姜明凯. 乡村振兴工作队评估指标体系研究——以三亚市为例[J]. 村委主任, 2023(1): 151-153.
- [9] 王标, 张旭. 关于推进三亚市美丽乡村旅游经济建设的思考——以博后村为例[J]. 山西农经, 2021(21): 48-49+52.